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
中国教育改革的社会学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吴康宁

集体性知识

中国教育改革的社会学解释

JITIXING ZHISHI

马维娜/著

历时30年的中国教育改革，

呈现、讲述、生发、制造了太多的可能与不确定性，

其中的复杂似乎是一个常理。

但这是一种怎样的复杂？这种复杂运行的大致逻辑是什么？

这种逻辑对教育改革已经带来什么？可能带来什么？

又怎样影响教育改革的预先设计、实际进程和阶段性结局？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丛书主编/吴康宁

JITIXING ZHISHI

集体性知识

中国教育改革的社会学解释

ZHONGGUO JIAOYU GAIGE DE
SHEHUIXUE JIESHI

马维娜/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集体性知识：中国教育改革的社会学解释 / 马维娜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2

(中国教育改革的社会学研究丛书 / 吴康宁主编)
ISBN 978-7-5495-1036-8

I. 集… II. 马… III. 教育改革—改革—中国
IV. G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923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541100)

开本：720 mm × 960 mm 1/16

印张：15.25 字数：200 千字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正处于进行时的“中国教育改革”注定要成为世界教育改革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理由至少有三:

第一,从范围上看,这场改革无所不包。——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直至高等教育,覆盖所有教育阶段;从制度架构、师资培养、课程内容、教育方式、管理形态、评价机制直至资源配置,涉及教育系统所有层面。而这样一种全域性的教育改革,通常只是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颠覆性革命后才会进行。

第二,从过程上看,这场改革扑朔迷离。——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对于教育改革似有广泛共识,一些改革举措甚至呈现摧枯拉朽之势。但其后不久,在有关教育的价值取向、方针政策、框架内容及推进方式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便都出现了观点分歧与行动分离,从而在实际上形成了教育改革的“支持力量”、“中间力量”及“反对力量”。于是,许多改革开始变得进展缓慢乃至举步维艰;不少改革起初轰轰烈烈,其后冷冷清清,继而徒有其名,最终偃旗息鼓乃至原路返回;还有一些改革虽然总体上有成效,但代价高昂,回报远不如预期。^①与此同时,由于国家不断表明继续推进改革的坚定决心,“改革”逐渐被确立为一种不容置疑的旗帜与纲领,于是,对于教育改革的一些不同声音与行为便逐步从“前台”转向“后台”;^②三心二意、空喊口号、虚与委蛇、忽悠作秀等也就成为混

① 吴康宁. 教育改革社会学的兴起及发展路向.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09(第6期).

② 加拿大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理论”将人的日常生活视同于舞台表演,将人们的行为空间分成“前台”与“后台”两个不同区域,前台中的行为是受规范制约的角色表演,后台中的行为则是自我的真实呈现. 详见戈夫曼著,黄爱华、冯钢,译.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第三章“区域与区域行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杂于教育改革之中的一些常态现象；甚至，借改革之名行谋私之实的现象也并非凤毛麟角。所有这些，都使得人们很难仅凭各种公开的文件、仪式、会议、活动以及相应的媒体报道，就能准确判断教育的实际进程与实际效果。中国教育的这种泥沙俱下、暗流丛生的复杂局面实属世界教育史所罕见。

第三，从时间上看，这场改革旷日持久。伴随着整个社会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教育改革迄今已逾三十年。而2010年7月正式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时段（2010至2020年）则表明，这场改革至少还将持续十年。至于在此之后，这场改革是否仍将延续下去，谁也无法准确预测。这样一种超长时段的全国性教育改革在世界教育史史上也可谓前所未有。^①

这就使得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其一，由于“改革”已经成为迄今三十多年来并仍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内中国教育的一个关键词，因而，撇开中国教育改革研究，也就谈不上关于当今中国教育的研究。其二，由于教育改革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整个改革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撇开中国教育改革研究，也就达不成对于中国社会整个改革的全面认识。其三，由于中国教育改革事实上已成为当今世界教育改革中既不可或缺又十分特殊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撇开中国教育改革研究，关于当今世界教育的改革也就很不完整。

本套丛书便是“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集体成果。在我们看来，区别于其他类型的研究，教育改革的社會学研究所关注的，是教育改革过程中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经历着怎样的博弈，进行着怎样的互动或互闭、交流或交锋、对话或对抗；教育改革结果对于特定人群而言是获益还是受损抑或非益非损；而研究结论则应建立在对“改革事实”的考察、分析、揭示及解释的基础之上。人们可以依据这样的研究结论，从一个侧面对教育的政策与

① 吴康宁：《中国教育改革为什么会这么难》，《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4）。

实践提出基于价值判断的行动建议。

本套丛书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以中国教育改革整体为对象的研究,包括《集体性知识:中国教育改革的社会学理论解释》、《失衡的博弈: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教育改革》;二是以不同教育阶段的改革为对象的研究,包括《常识的颠覆:学前教育市场化改革的社会学研究》、《“不可能”的行动:基础教育均衡化改革的社会学研究》、《精英的合法性危机:高等教育改革的社会学研究》、《以公正的名义:高考制度变迁的政策社会学研究》、《情境逻辑:底层视域中的大学改革》;三是以某一类教育的改革为对象的研究,包括《“教师教育”的诞生:教师培养权变迁的社会学研究》、《怎一个“农”字了得:农村教育改革的社会学研究》、《在生活化的旗帜下:学校道德教育改革的社会学研究》、《由“情”入“理”:学校政治教育嬗变的社会学研究》。

如上述书名所示,本套丛书并不奢求对于教育改革的面面俱到的探讨,而是力图从社会学角度去审视那些贯穿于教育改革整个过程之中的核心议题、基本线索或关键特征,或者说,聚焦于那些对教育改革的社会学分析可以起到某种纲举目张、画龙点睛作用的东西,譬如“集体性知识”之于中国教育改革的“诞生过程”、“常识的颠覆”之于学前教育的市场化改革、“精英的合法性危机”之于高等教育改革、“生活化的旗帜”之于学校道德教育改革、“由‘情’入‘理’”之于学校政治教育改革,等等。我们不敢断言我们的这一研究路向绝对合理,更不敢宣称我们的努力已经成功。这一切都得留待读者去判断与批评。

我们所可聊以自慰的是,我们的心与血是热的:我们热切希望中国教育改革能够为中国教育的转型与发展从而为中国儿童与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热切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为真实地了解与理解中国教育改革从而为认真地反思与改进中国教育改革作出一点科学层面的贡献。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头脑是冷静的,我们在基于我们的深切关怀与价值判断而确立研究主题、进入研究过程之后,便尽力排除我们自身

的价值取向与文化“偏见”的干扰,以免导致所谓的“研究结论”产生于研究过程之前、所谓的“研究过程”事实上只是价值预设的附庸,尽管我们知道,对于任何研究者来说,都难以完全排除自身价值取向与文化偏见的影响。

我们还可聊以自慰的是,本套丛书也是“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为中国教育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的一点真诚努力。作为教育社会学方面的第四套系列学术著作,本套丛书与此前我们所编撰出版的三套丛书有所不同。第一套的《教育社会学丛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旨在推动中国内地教育社会学分支领域的形成与发展,第二套的《现代教育社会学研究丛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旨在促进中国内地教育社会学对于各种实实在在的现象与问题(不限于某一分支领域)的实实在在的研究,第三套的《社会学视野中的中国教育丛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旨在凸显社会学视角对于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基础性价值,而本套《中国教育改革的社会学研究丛书》则是对某一具体教育问题进行系列社会学研究的一种尝试。我们希望通过上述持续不断而又有所侧重的系列化研究,也为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实质性发展不断增添一些自己的东西。我们同样不敢断言我们的这一“发展方式”绝对合理,更不敢宣称我们的努力已经成功。这一切同样得留待读者去判断与批评。

本套丛书得以出版,离不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原副社长孙杰远先生的鼎力支持,离不开丛书责编陈玲女士的倾力帮助,原任责编莫立芸女士为丛书出版的选题确定等基础性工作费心尽力,广西师范大学王枏书记也在百忙中予以热情关注,在此一并致谢!

吴康宁

2011年元旦于金陵天地居

目录

引论 理解的厚度、浓度、限度 / 1

- 一、国家、民族、群体那些事 / 2
- 二、理解社会之“度” / 5
- 三、中国教育改革:理解什么 / 12

第一章 中国教育改革释绎的时空逻辑 / 18

- 一、历史的“时间之流” / 19
 - (一)“社会时间”与“哲学的历史” / 20
 - (二)“中国事件”与“解释时间” / 22
 - (三)文化的脉络关联 / 24
- 二、解释的“空间格局” / 27
 - (一)区系类型的背景观察 / 28
 - (二)乡土社会的空间治理 / 31
 - (三)成为日常生活的空间关系 / 33
- 三、谁都可以言说的教育改革 / 35
 - (一)“诞生”的日常遮蔽 / 35
 - (二)“诞生”的改革建构 / 37
 - (三)寻找本土解释力 / 38

第二章 集体性知识:中国教育改革的一种解释框架 / 44

- 一、知识、分类与使用:思想主张的门户 / 45
 - (一)知识的已有胸襟 / 45

(二)分类与思想的实质联姻 / 48

(三)宽泛开放的使用阈限 / 51

二、集体与集体性:整体的或集合的精神气质 / 52

(一)集体与集体性再发现 / 52

(二)集体性的现实凝视 / 54

(三)集体性名义、集体性情结、集体性场域感 / 55

三、理论资源:阅读的可选择性 / 59

(一)奥尔森、克罗齐耶: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 59

(二)涂尔干:群体共识的符号解码 / 60

(三)哈布瓦赫:历史感存续的集体记忆 / 62

四、集体性知识:整体视角、过程建构、方法意义 / 64

(一)作为整体视角的集体性知识 / 65

(二)作为过程建构的集体性知识 / 66

(三)作为方法意义的集体性知识 / 67

第三章 “整个的个体”:中国教育改革中的国家、地方、学校 / 71

一、家庭镜像的国家特质 / 74

(一)一国式家庭与拟制的家 / 74

(二)家产制下的权力与权利 / 79

(三)集体与复数的“我” / 82

二、“中”的规则锤炼 / 84

(一)生存法则的技术专属 / 85

(二)轨迹与流程的走势 / 87

(三)强与弱的力量分配 / 91

三、改革秩序的集体情结 / 93

(一)维稳的情感能量 / 95

(二)尊崇的道德权威 / 99

(三)被考验的执行力 / 101

第四章 国家观念：需要至上 / 105

一、植根性与合法性 / 107

(一)数量表征的农业大国 / 108

(二)“一种”与“多种”引导 / 113

(三)成为国家惯习 / 116

二、符号系统的制造 / 120

(一)声势浩大的国家动员 / 120

(二)短词、短语、指令 / 125

(三)“试行”反复使用 / 129

三、代价计算的审时度势 / 131

(一)从国家责任到全民分担 / 132

(二)关系区分与公地悲剧 / 134

(三)回到解释：圆融、圆通、圆满 / 138

第五章 地方法则：因时博弈 / 144

一、上通下达的运作逻辑 / 146

(一)渗透与吸纳的节奏：时间的“中”智慧 / 146

(二)在别处权宜：空间的“中”智慧 / 150

(三)做能做的：行动的“中”智慧 / 154

二、拒绝孤岛的情感建构 / 158

(一)改革情面的“给”与“取” / 159

(二)“在一起”的感觉 / 163

(三)数据的集体感染 / 165

三、集体性获得与集体性放逐 / 168

(一)以为是并非 / 168

(二)以为有并非有 / 170

(三)以为得并非得 / 177

第六章 学校游戏：效用生产 / 181

一、学校：勾连与重组的往复周期 / 183

(一)变化中轴的显与隐 / 183

(二)发声宣讲的重与轻 / 186

(三)生存谋划的一与多 / 189

二、教师：传播与生产的介入距离 / 191

(一)“说”与“听”的权威尊崇 / 192

(二)“走”与“留”的精英期待 / 195

(三)理念的技术简化 / 200

三、学生：抽象与剥离的声音考古 / 202

(一)“被重要”的学生 / 203

(二)“契约式”选科生产 / 207

(三)榜样力量的民间膜拜 / 211

结语 集体性知识继续行动 / 214

一、“不变”与“多变”：文化植根中的关系格局 / 215

二、“此一”与“彼一”：本土研究中的学科互融 / 219

三、“一”与“所有”：人类社会中的中国教育改革 / 224

解释性理解具有两种意义。其中的第一种意义是像感染一样的与另一种心理的关系(就像在理想的情况下,某个人进入一个房间,而我们通过本能的心理感染,在他一言不发的情况下“理解”那样)。第二种意义则是由于下列事实而对某种生活脉络的洞察,即我们在一个具有联结性的经验性空间内部,通过运用它那些特殊的集体表象,逐渐达到了某种移情性介入状态。与第一种解释性理解形式仅仅由于我们具有进入心理感染过程的能力就有可能存在不同,第二种解释性理解形式是由于我们所具有的、理解那些最多种多样的和富有意义的形成过程的精神能力,才成为可能的。

——[德]卡尔·曼海姆



理解的厚度、浓度、限度

亚历山大在《社会生活的意义》一书中列举犹太种族浩劫这一过去发生的具体事件对现代人的影响时,用大量篇幅讲述这一事件是如何转变为一个代表人类苦难和道德堕落的普遍象征符号的过程,其用意在于强调:今天人们认识中的这一时代恶事件,已经不是当年亲历的真实事件,而是一个被层层建构的集体陈述,一个标志民族种族仇恨的泛化符号的事实文本。它所转述成功的“放纵的恶”对点醒人们同情受难者、指点现时代内在的道德普适主义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① 亚历山大言说中潜隐的重要价值与方法论理念在于,在“集体”的纬度建立历史和现代的时空关联——既是对于苦难与堕落的集体记忆,也是代代相传的集体

^① 周怡.强范式与弱范式:文化社会学的双视角——解读 J. C. 亚历山大的文化观. 社会学研究,2008.(6).208.

陈述,记忆和陈述的“集体性”反过来又聚集为以种族仇恨为共同情感的“集体行动”的无形而巨大的能量。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历史的秘密目标和深邃动机就是要说明现时。“人们若不联系过去,就几乎不能懂得现时。历史同时是对过去和对现时的认识,是对已经发生的和正在进行的演变的认识,因而在每段历史时间内——无论是昨天或是今天——,都要区别持续存在的因素和转瞬即逝的因素。”^①

一、国家、民族、群体那些事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虽造就出置身各种境遇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但这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群体所经历的某些事件的相似与多变,所浸染的文化与想象,却如同这大千世界一样始终无法涂抹。

一个国家的事件。一本由美国人出版的《朝日新闻》,从1986年开始征集读者来信,试图记录日本普通国民对于二战的回忆。第一封信是66岁的熊田雅男写的。“有人质问,当初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作出的决定’不抱怀疑。”直到1986年,63岁的岩浪安男仍然认为:“为了我国的安定,必须绝对保证我国在包括满洲国在内的中国大陆的利益,如与英美妥协,等于将我国的未来听任他们的安排。”他说,“我是被这样教导的,我也相信这一点”。当时小学三年级的古泽敦郎在信中回忆说:“市礼堂的柔道拳击对抗赛,日本人与美国人对抗,从头到尾,观众兴奋不已,给柔道选手鼓劲,斥骂拳击选手。”他说,“从小,我们对于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就要当兵,没有任何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日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

的确,今天我们见到的这些普通的人,富有人性的人,当年为什么会

^① [法]菲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过去解释现时.资本主义论丛.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121.

变成冷酷残忍的施暴者？我们听到的说法是，战争的原因是当时右翼分子和军国主义者控制了个国家。但是，如果只有控制与镇压，没有普通国民的支持和参与，没有母亲们把酒持盏送儿子上战场的激情，这场战争就不会演变成如此巨大的灾难。同样，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懂得热爱家园、知道畏惧死亡、能够亲其亲并且对邻人友爱的人，为什么可以接受甚至鼓吹接受侵略与杀戮而沦为汉奸？这些应该是有着足够道德良知的个体，为什么会落入集体性的狂热和盲从之中？每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不妨都这样问问自己。《朝日新闻》的编辑在解释出版此书的用意时说：一个人忘掉过去可能有自我净化的作用，但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同了，尽量掩盖，假装这类事根本没有发生过，难道对我们民族的良知没有损害么？^①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狂热还是盲从，无论宽容还是掩饰，都深深烙印着国家这个“集体”不易磨灭的痕迹。

一种民族的事件。涂尔干在他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以一种形象、具体的方式呈现了集体力量创造神俗观念的过程，或者说，是一种“集体欢腾”创造了宗教的过程。在瓦拉蒙加人宗教仪典中，最重要的是沃龙迦蛇仪典，更为狂暴的场面则是瓦拉蒙加人有关火的仪典。从傍晚时分开始，各种队列、舞蹈、歌唱都在火把照耀下进行，普遍的欢腾持续高涨。一个指定的时刻，有12个人每人拿起一把熊熊燃烧的火把，其中一个就像拿刺刀那样拿着火把，他们冲入一群土著，而对方则用棍棒和标枪抵挡攻击。随后就是一场全面的混战。人们到处蹿蹦跳跃，不停地发出野蛮的尖叫，燃烧的火把在人们的头上和身体上不断爆裂，火花四溅。斯宾塞和吉兰说：“烟雾、炽烈的火把、四处溅落的火星，成群结队的舞蹈、大呼小叫的人们，共同形成了一种实在野蛮暴戾的场面，简直无法用任何适当的语言加以表达。”可以想象，当一个人达到了这种亢奋的状态，他就不可能再意识到自己了。他感到自己被某种力量支配着，使他不能自持，所思所为都与平时不同，于是，他自然就会产生“不再是自己”

^① 柴静，对历史说真话才能对现实说真话，读者，2009。（7）。

的印象。他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存在,而他佩戴的装饰和遮脸的面具从物质方面也形成了这种内在的转化,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来确定它的性质。与之同时,他的伙伴们也感到自身发生了同样的转化,并把这种情感表达为叫喊、动作和共同的姿态,一切都仿佛是他们果真被送入另一个特殊的世界,一个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异常强烈的力量的环境——这力量左右他并使他发生质变。像这样的体验,而且是每天重复、长达几个星期的体验,怎么可能不使他深信确实存在着两个异质的、无法相互比较的世界呢?在一个世界中,他过着孤单乏味的生活;而他要突入另一个世界,就只有和那种使他兴奋的发狂的异常力量发生关系。前者是凡俗的世界,后者是神圣事物的世界。所以,宗教的观念似乎正是诞生于这种欢腾的社会环境,诞生于这种欢腾本身。既是“集体”形式的欢腾,更是创造“集体”的欢腾。^① 宗教本质上是以信仰形式对超越于个体之上的实体力量(在其现实性上是集体力量)的缔造和崇拜,正因为如此,宗教代表了一个民族或种族的集体情感,具有不可究诘、不可反思的神圣性和神秘的精神力量。这种情感如此神圣,乃至亵渎了一个民族的宗教,就亵渎了这个民族的集体情感,必然激起全民族的拼死抵抗;这种力量如此神秘,甚至可能形成全民族的宗教狂热。

一类群体的事件。这类群体被裹挟在百年历史政治文化的漩涡之中,其经历以历史档案的形式整理出来,如“沧桑文丛”、“历史备忘录系”、“大象人物日记丛书”、“大象人物书简丛书”等,讲述的是那个特定时代里一类群体的独特生活片断。譬如冯亦代的《悔余日录》,详尽记录了他成为右派分子后的日常生活,包括人际交往、读书情况和心理活动。一方面,陷入逆境后的痛苦,被改造者的无奈,依然强烈的求知欲望,对平等身份的企盼,紧紧交织在一起,凸显出一个知识分子弱者的形象;另

^① 参见[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88—289。

一方面,他在日记中记录的与一批右派知识分子如费孝通、潘光旦、章伯钧等当年的往来情况,使得其“卧底”形象令身边熟悉的人“读后全身瘫软,一张报纸都举它不起。因为他的这个‘角色’,与章家两代人交往的深情厚谊以及那笑脸后面的一片慈祥,在我是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可证据就摆在那里,你不信也得信,你无法接受也要接受”。《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中的当事人杜高先生觉得,自己人生的阴暗面或者在大的背景下被迫做的事情,是他个人的,也不是他个人的,是他那一代人的真实写照。^① 鉴乎古今,诸多表面个体的事件往往都镌刻着“集体”的烙印。古希腊神话中大力神安泰是地神该亚之子,一旦离开大地就丧失全部力量,最后在与赫拉克利斯的格斗中被扼死在空中;鲁迅曾经说过,一个人要摆脱处于其中的那个传统(或者说传统的集体记忆),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集体记忆》的作者哈布瓦赫断言,任何记忆都是集体记忆。由此可以延伸,只有在集体行为的具体社会情境中,才能理解和复原个体行为尤其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个体行为的历史真实性。

上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的历史事件叙述表明,任何社会事件,如果撇开具体的历史情境,很容易得出简单化的结论,但如果完整、客观地阅读历史,就会不仅发现历史的真实与鲜活,还会发现在解读中让历史延展与复活的方法论要旨。

二、理解社会之“度”

如果以为彼得·伯格的“社会学不是实践,社会学尝试的是理解社会”的诊断,只是在论述社会学家形象时的一种辅助界定之语,可能窄化了其内在意蕴,或弱化了其想象空间。事实上,在“理解社会”的轨迹中,

^① 李辉,写好一个“人”字——关于“历史叙述”的思考, www.china.com.cn/culture/txt/2009-04/21/c...22K 2009-4-21;章诒和,卧底,南方周末,2009.4.1.

我们会发现,社会学眼中的理解社会更多的不是对社会具体问题的滞留,而是对这些具体问题的凝练。或者说,“社会学问题不是权威部门认为‘出错’的事情,也不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出错’的事情;相反,社会学问题首先是整个系统如何运行、有何预设、靠什么结合为一体的问题”。更为形象地说,“社会学的根本问题不是犯罪而是法律,不是离婚而是婚姻,不是种族歧视而是以种族界定的社会分层,不是革命而是治理”;不是对社会学知识的如何具体运用,而是对知识为何与何为知识的追究。^①这样说并非表明社会学要在具体问题与整体关注、知识运用与知识本源、现实实践与理论理解之间人为制造难以逾越的鸿沟,相反,正是这样的区分与关联可能促使两者之间生成新的理解与新的发现。

理解社会之厚度。^②“理解社会”不是历史时间的单一延长与简单叠加,“而是将已往似乎已经完成的历史与当今世界秩序的形成过程、与目前还在展开的世界大格局紧密相联,要对历史和时间的关系提出与过去根本不同的思考与理论建树”。^③在这种理解中,上述国家、民族、群体的事件已经不是单纯的国家、民族、群体的事件,也并不止于事物间或温和平坦、或粗暴强力这样的简单关系,否则,事物的规律要简单得多。事实上,“断裂、界线、裂口、个体性、力量”等的存在形态才是事物的常态,而对问题理解的单向度充其量只是寄托了人类的美好遐想,却无法回避人类的幼稚病所在。理解的厚度拒绝人为割裂连续与间断、狭小与宏大、表面与深层之类的事物间的关联,它首先带来的是已存的过往历史与变异的现今事实之间某种相似性的激励。

相似性的描述在福柯的词与物关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按照福柯

① [美]彼得·伯格,与社会学同游,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41.

② 这一概念借鉴赵旭东先生的表述,原文这样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真正有厚度的理解而不是有厚度的描述,我们还需要多个视角的观察而非单一视角的审视,我们更需要有跳出自我想象、对于他者的整体生活世界的理解而非偏安一隅的自我想象与孤芳自赏。”赵旭东,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及其创造性转化,林聚任,何中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4),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③ 刘禾,“话语政治”和近代中外国际关系,读书,2010,(1),21.